



下一处 前沿

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已取得了立足之地，
但前方依然道路坎坷

Masood Ahmed

今年6月，肯尼亚Safaricom手机公司的可流通股首次登台亮相，这是目前东非地区规模最大的IPO，该公司的股份随之激增了500%。Safaricom现在已拥有860,000余名股东，超过了肯尼亚的任何其他公司。媒体认为该领域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因为只有1/3的肯尼亚人拥手机，而这一比例在8年前还不到1%。

整个发展中世界——从越南的稻田到莫桑比克的热带海岸——都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奋斗，他们也逐渐成了投资者竞相争夺的下一处投资前沿。越南的家庭收入贫困率已从1993年的58%下降到2006年的16%，使3,400万人口摆脱了贫困。莫桑比克在2000年的时候每1,000名婴儿中就有126名夭折，而到2006年，这一数字也降到了96名。

现今国际社会已达成普遍共识：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是贫困国家摆脱贫困的关键，近期许多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那些位于非洲的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表现令人振奋。2003—200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6%，在这一成绩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更有利的经济政策（这一地区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实行扩张和紧缩交迭的经济政策，致使经济徘徊不前还引发了通货膨胀，今天的政策已比当时有了长足进步）和改善的贸易条件，20世纪60年代以来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为这一转变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这些只是全部事实好的一面（见专栏1关于低收入国家的差异）。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最底端的10亿人”（Collier, 2007）来说，前途依旧黯淡无光。在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其在那些饱受冲突、制度混乱的脆弱国家中，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设定的各项经济和社会任务似乎愈发希望渺茫。即使是南非——公认未

来十年全球的主要减贫力量——也有可能无法达到基础教育普及率、实现高等教育性别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和营养不良等方面的目标。

这些预见的结果难道不可避免吗？不是。这要取决于低收入国家的表现和全世界对这些国家的支持力度。本文指出，当今低收入国家正面临着4大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应对粮油价格上涨、妥善利用多变的援助、发展强大的私人部门并深化金融市场、提高各项制度的质量。虽然其中一些挑战早已老生常谈，但由于历史、时间、地理位置等因素，它们也出现了特别的细微变化，着重点有所偏移。因此，要制定正确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也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和传统。

应对高涨的粮食和燃料价格

低收入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要应对持续攀升的粮食和燃料价格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高通货膨胀、平衡国际收支以及改善不断恶化的贫困境况，其中一些国家甚至面临倾覆的危险。由于境况不断恶化，这些国家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随时可能灰飞烟灭。

持续走高的粮价对贫困国家居民购买力的直接影

响更大，因为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一半以上都用来购买食品，用于燃料消费的部分还不到10%。受影响最大的是城市贫困人口。当贫困家庭食不果腹时，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就会急速上升，而儿童和孕妇群体营养不良将对人类发展产生长远影响。增长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2008）指出，营养不良会降低生产力，进而阻碍长期经济增长。

“持续走高的粮价对贫困国家居民购买力的直接影响更大，因为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一半以上都用来购买食品，用于燃料消费的部分还不到10%。”

如果再不及时、有针对性地应对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做出一致反映，那么低收入国家的1亿人口就有可能身陷贫困。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也需要长期措施。国际社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向贫困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其应对由于进口粮食价格的上涨而面临的资金压力以及由于扶持贫困人口而导致的财政紧张。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应当通过暂时、有针对性的补助

专栏1

什么是低收入国家？

经济学家经常用“低收入国家”这样的字眼指代那些人均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国家。例如，世界银行把49个国家放在这一行列，这些国家的平均个人年收入还不到935美元（2007年的标准），但由于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许多人的年收入可能远远低于此数，而某些人的年收入又可能是这个数字的数倍。像许多按收入或GDP分组的方法一样，这种分类法有自己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给了人们一个相对整体的视角来探讨低收入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大。这些差异既与静态的环境因素有关——例如地理位置，也与较为动态的经济进展因素有关——即这些国家的发展情况如何（见下表）。

这样，根据发展状况细分图有区别得看待“低收入国家”就变得很有意义。从过去十年的经济绩效来看，这些国家中约有1/4的国家平均收入增长了50%或更高，另外1/2的国家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余国家的平均收入则没有变化甚至下降。这一分布图既有助于突出不同低收入国家独特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又不含混其共同的

贫困国家分布图

低收入国家在很多方面存在千差万别，其中也包括经济增长率。

实际人均GDP 增长率， 1997—2007年	国家
高于50%	乍得，柬埔寨，缅甸，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塔吉克斯坦，越南
25%—50%	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达加斯加，马里，尼泊尔，巴基斯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
0%—24%	贝宁，肯尼亚，几内亚，马拉维，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乌干达，也门，赞比亚
负增长	布隆迪，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刚果（金），科特迪瓦，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利比里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多哥，津巴布韦

资料来源：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和世界银行。
注：阿富汗、朝鲜和索马里三国的数据无法获得。

经济目标：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和削减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所有人带来体面的生活和机会。

或提高援助力度向贫困人口和脆弱人口实行低粮价政策。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应该尽量避免采用价格扭曲政策，以市场为导向解决问题才是上策。也就是说，不要滥用补贴降低国内粮食价格、直接实施价格管制或限制出口——这些措施会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并可能最终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粮食和燃料价格的高企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创下新高。这些价格螺旋上升给今后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了无数挑战。第一，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令人担忧。通货膨胀已成为头等大事并在许多国家有蔓延的趋势，这对那些在食品上的支出远远高于在其他商品上支出的国家造成的影响更大。由于粮食和燃料价格不可能快速回落，因此通货膨胀还可能继续走高。目前一个棘手的政策挑战就是如何降低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降低至一位数——以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

第二，高粮食和燃料价格会对国际收支造成巨大冲击（见表）。IMF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2008a和2008b)显示，高粮食和燃料价格给许多进口粮食和燃料的低收入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许多国家的高额支出超过了GDP的2.5%，利比里亚甚至高达GDP的15%，几乎耗尽该国全部的国际储备。虽然一些国家短时期内可以凭借高额出口收入和资本流入缓解高粮食和燃料价格对其国际收支的冲击，但预计近1/2的非洲国家2008年进口粮食的开支增加额将超过其GDP的1%。这一增加额在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最高，例如厄立特里亚和冈比亚（超过2%）。

第三，尽管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内可以让那些商品出口国受益，但却制约了这些国家的预算管理系统，难以确保出口商品产生的收入得到有效、透明地利用。这些国家需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还应应对外汇流入。幸运的是，许多国家都在尽力避免波动的大宗商品价格给其宏观经济带来破坏性打击，这一价格的起落有时是由上一经济周期中松懈的管理而导致。不少国家都为这些资金（可能是暂时性的）收入做了专门安排，以期让它们发挥最大的长期作用。

最后，粮价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高位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国家应当鼓励扩大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方式很多，例如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分配系统和库存系统；通过竞争提高效率；提供稳定的监管环境和融资渠道；扫除贸易壁垒等。事实上，Ravallion 和van de Walle（见本刊第38页，“东亚改革中的土地和贫困问题”）早就强调了越南和中国两国的耕地改革在减贫方面的重要性，并希望其他低收入国家借鉴这一经验。

最严重的冲击

粮食和燃料价格的高涨严重冲击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收支。

BOP影响相当于GDP的百分比				
	食品	石油	其他 大宗商品	总影响
利比里亚	-4.5	-11.1	0.3	-15.3
几内亚-比绍	-1.1	-7.6	0.0	-8.8
厄立特里亚	-2.4	-6.1	-0.1	-8.6
科摩罗	-2.7	-2.9	-0.9	-6.5
多哥	-0.4	-5.6	0.6	-5.5
冈比亚	-2.7	-2.3	0.0	-5.1
马拉维	-0.8	-2.9	-1.0	-4.7
塞拉利昂	-0.9	-3.7	0.1	-4.4
几内亚	-1.6	-3.6	1.0	-4.2
马达加斯加	-0.7	-3.1	0.0	-3.7
布隆迪	-0.4	-3.9	0.9	-3.4
埃塞俄比亚	-0.8	-2.6	0.4	-3.0
布基纳法索	-0.3	-2.7	0.5	-2.5
中非共和国	-0.8	-1.8	0.1	-2.4
贝宁	-0.6	-2.0	0.3	-2.2
刚果（金）	-1.5	0.0	0.0	-1.5
津巴布韦	-0.4	-1.7	0.8	-1.3

资料来源：IMF（2008b）；联合国的商品贸易数据库；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国际收支（BOP）影响是指由各国贸易条件变化导致的贸易收支变化，具体是指：与2007年相比（即2007年的贸易额），2008年进出口预期价格的增量占GDP的百分比。计算中所涉及的2007年油价为71.1美元/桶，2008年为112美元/桶。数据截至2008年6月30日。

让援助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提高援助的有效性。近一半的低收入国家长期严重依赖外部援助向自己的发展项目提供融资。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停滞，援助金额近年来开始大幅度上涨，国际社会也试图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援助在减贫和促进增长方面的有效性。许多新的援助国也开始加入发展融资这一行列。不断扩大的援助给受援国带来了崭新的机遇，但也向援助国和受援国施加了压力，这些国家应确保援助能够得到有效管理和利用（有关这一问题见本刊第15页，“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非传统”双边援助国（指那些非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国家）、全球基金、私人基金会、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改变了援助国的格局。非DAC双边援助国的数量已超过23个DAC国家的数量，包括巴西、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委内瑞拉、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一些中东产油国以及一些新的欧盟成员国。这些援助国2006年提供的援助资金总额估计超过了120亿美元。据测算，仅中国和印度一年就提供了大约30亿美元的联合援助，而且都在制定更大型的援助项目。

相对于新的援助国而言，全球基金则更关注于具体项目，尤其是卫生领域的项目，而且也日益成为资金和项目供给的重要载体。如果能把这些“载体基金”与国家层面的“基础设施水平供给”整合起来将极大提高援助的效率。此外，包括各大基金会在内的私人援助也提供了大量援助资金。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仅2007年一年就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此外，据OECD估计，DAC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援助了大量资金。

这些新的参与者给发展融资带来了额外的资金、新颖的主意和全新的商业模式。但随着越来越多小额援助者的加入，如何更有效地选择项目、提供援助和管理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Kharas, 2007)。举例来讲，平均每个国家的援助者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12个增加至2001—2005年的33个。目前有230个国际组织、基金和项目在提供援助——已经超过其打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对于管理能力有限的受援国来说，要管理好来自众多不同援助机构的援助着实不易，因为不同的援助机构都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执行和监管项目。这就需要援助机构在援助程序上协调一致，向受援国提供便于管理且质量更高的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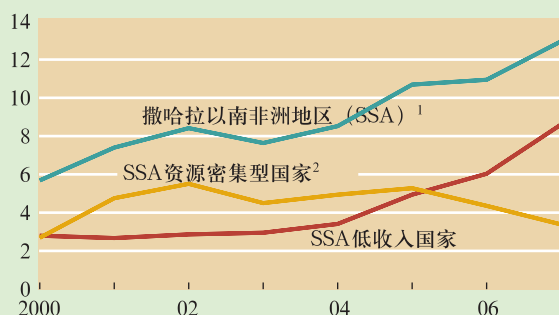
2005年，援助国和受援国在援助有效性问题上形成了《巴黎宣言》，做出56项承诺保证更好地提供和管理援助。尽管《巴黎宣言》的实施已在援助系统上掀起了重大改革（见本刊第20页，“尚在进行中的工作”），但援助项目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与受援国的优先需求相协调。需要关注的重点有：使援助的优先要求更好地与受援国的目标协调一致；确保债务长期稳定；使援助具有更好的预见性（见本刊第34页，“解决援助中的意外问题”）。从受援国的角度来看，有一点非常重要：那些近年来享受债务减免的国家应确保其不会因可得到的资金增加而重新陷入债务不可持续的困境。

营造一个良好的商业氛围

第三个挑战就是如何营造一个能够激发私人部门活力和竞争的商业氛围，让私人部门创造就业机会并支持国家全面增长。要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一方面就是要发展流动性强、运行良好的国内资本市场，为私人部门的发展提供动力。

上升趋势

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低收入国家的私人资本持续增长。（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IMF（2008c）。

¹不包括南非和尼日利亚。

²不包括尼日利亚。

更好地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是一个筹集外国资金的重要机会，这些资金可以用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私人资本在过去7年中几乎增加了4倍：从2000年的110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530亿美元。自2004年以来，低收入国家群体的私人资本迅速增加，但资源密集型低收入国家的私人资本却有所下降（见图）。2001—2007年间，流入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保持不变，维持在150亿美元到210亿美元（IMF, 2008c）。

事实上，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经获得“前沿新兴市场”的头衔，其资本市场已经足够成熟，国际投资者可以进行证券投资组合（见本刊第30页，“非洲前沿市场的兴起”）。加纳就是一例，该国于2007年9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了7.5亿美元面值的债券，认购溢价却高达面值的4倍。与加纳的情况类似，加蓬也发行了10亿美元债券用来偿付对巴黎俱乐部的债务。

一些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债务可持续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非洲国家同样也成功地向外国投资者发行了以本币作为面值的债券。截至2007年6月，外国人持有的以发行国货币为面值的政府债券在赞比亚超过14%，加纳为11%，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数量也很可观（Wakeman-Linn和Nagy, 2008）。

然而，虽然一些非洲国家表现得很好，但另一些却不尽如人意。事实上，数据显示，尽管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私人资本占全球私人资本的比例一直在上升，但这些资金在国家间的分布却不均衡，而且数额不大也不具有多样性，如果除去FDI因素这一状况则更加明显（Ratha、Mohapatra和Plaza, 2008）。在2000—2007年间，仅南非和尼日利亚两国就拥有非

洲全部FDI的一半，证券投资组合的85%以上都集中在南非（IMF，2008c）。对许多低收入国家来说，官方援助和他国政府拥有的国有机构提供的官方FDI仍是其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

资金短缺的国家需要放宽对经济的管制来吸引更多投资和外部资金。这些国家能否成功地与全球经济接轨，关键是要建立合适的政策框架并且有步骤地实施自由化战略。但是对外部资本敞开经济的大门是有风险的——在这一点上，低收入国家可以借鉴现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

为资本账户设计合适的政策以及向自由化战略提供资金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短期来看，这需要审查资本账户的监管制度，提高透明度、连贯性和有效性。从中期来看，需要建立一个有步骤、合时宜的自由化战略——首先放松对稳定的长期资本的管制，这样就有充足时间加强对私人部门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并让这一监管框架生根发芽。此外，这些国家还应培养本国监督资本流动的能力。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放松现有的各项管制。

低收入国家需要在各方面加强对本国债务的管理并发展证券市场——从法律、监管层面到基础设施层面都应该加强。通过发展合适的本币借（贷）体系，这些国家可以在提高本国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深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也可以为公司在市场上融资创造健康的环境。

完善制度

第四个挑战是如何完善各项制度来促进发展（例如，见2005年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非洲的报告）。人们普遍认为发展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的稳定性。有研究表明，制度因素远远大于地理因素（见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8；Rodrik，2004），但制度的好坏与经济繁荣与否又互为因果。

良好的制度与经济繁荣并不是总呈线性或其他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脆弱的制度会打击政治意愿，需要对其进行重大改革或者用更合适的制度将其替代。同样，稳定的政治结构和法律结构有助于加强产权保护，这对吸引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当社会平等达到一定程度后，不同机构和个人都可以参与经济生活（Acemoglu，2003）。更多更好的投资是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低收入国家近年来已经实施了多项重大政治和制度改革。许多国家已采取了民主制度和多党派选举制。根据增长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2008），“许多国家[非洲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掌握实权，承诺促进增长，使政府更加开放、负责。许多方面的制度已经得到改进”。然而，还有更多任务等待这些国家去完成。

尽管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制度挑战，但国际

专栏2

IMF在低收入国家扮演的角色

今天，十亿余人每天还在靠不到1美元维持生活，极度贫困依旧是国际社会、尤其是IMF的低收入成员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这类国家占IMF全体成员数量的2/5。

IMF承诺通过其三大核心功能——贷款、技术援助、经济监督和政策建议协助低收入国家削减贫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并向中等收入水平迈进。

IMF关注的焦点是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因为这两者是持续增长和减贫的支柱。在这一大方向下，IMF在各个国家的工作则反映了该国具体的需求及其特殊的经济环境。IMF认为，各国的发展要靠各个国家自己的努力去实现，IMF需要与更多的援助群体和机构合作共同支持这些国家。

贷款。IMF贷款项目的80%都是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的。IMF通过减贫和促进增长贷款机制向国际收支失衡的贫困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并通过外部冲击贷款帮助这些国

家应对由外部冲击造成的暂时性资金需求。对于那些不需要资金援助的国家，IMF则通过政策支持工具帮助这些国家设计有效的经济计划，同时也表明了IMF对援助机构、多边发展银行和各种市场的支持态度。许多低收入国家同时也是符合降低外债倡议的目标国家。享受债务减免的国家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平均是支付债务开支的4倍。

技术援助。IMF向成员国提供援助和培训加强其能力以便更好地行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债务政策。IMF平均每年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的技术援助项目是向其他成员国提供数量的5倍。近年来，IMF又通过在太平洋地区、加勒比海地区、东非、西非和中非地区以及中东地区建立区域技术援助中心加大了援助力度。

监管。IMF定期向185个成员国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低收入国家因此而受益。IMF还通过强化各项工具的作用帮助这些国家在享受全球化带来好处的同时加强风险管理，例如，IMF会支持某些领域的发展，这些领域往往是增长和贸易的关键；在监督一国经济状况时，IMF也会把它对该国金融部门的分析纳入其政策建议。

社会尤其关注所谓的脆弱国家——即那些制度和治理软弱、社会紧张、政治动荡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那些陷入冲突和治理状况糟糕的国家（Collier, 2007）。这些脆弱国家的人口只占全部发展中国家的9%，但却集中了27%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国际组织有不同的方式来衡量脆弱度，通常是将制度的约束力和可靠性与衡量冲突风险的各项指标综合考虑。2006年，世界银行把35个国家划入脆弱国家的行列。

“只有当身陷贫困的国家取得多年的快速增长，只有当增长的成果被人们广泛享有时，削减赤贫这一目标才能实现。”

这些国家在增长与发展方面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2007年，世界银行—IMF的《全球监测报告》预测，到2015年，脆弱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将超过5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向脆弱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在2002—2006年间已由97亿美元增加至262亿美元，但这些援助的分部却极不平衡。在2005—2006年，这些援助的2/3都集中在4个国家——阿富汗、刚果（金）、尼日利亚和苏丹。

尽管技术援助可以帮助这些战后国家恢复一些关键制度，但这些脆弱的国家在改革初期的关键时刻往往无法动用足够的国内资源（见专栏2）。举例来说，卢旺达的经济和金融部门在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后全线崩溃，作为能力建设项目的一部分，世界银行与卢旺达银行——该国金融部门的主要监管者——展开了广泛合作，帮助该银行恢复其核心作用。除了技术援助，全球的协调行动也很重要，协调行动最近已经成功地帮助饱受14年内战之苦的利比里亚减轻了债务负担。

前方的挑战

削减赤贫是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最大挑战。只有当身陷贫困的国家取得多年的快速增长，只有当增长的成果被人们广泛享有时，削减赤贫这一目标才能实现。许多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近期的研究表明，虽然不同国家各自的增长动力有所不同，但国家领导层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经验多少可以告诉人们什么可能会起作用，什么又会徒劳无功。对于一些低收入国家来说，前方的挑战似乎无比艰巨。但应当

记住，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一二十年前也面临着相同困境。

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国家和国际发展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留待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解决，希望籍此能对这些国家有所帮助。其他领域的专家——例如健康和专家，基础设施和环境专家——也需要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因为增长和发展需要各领域全面进步。良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管理是开展这些工作的必要基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动员行动中，为实现这些目标发动广泛的支持力量和政治意愿。

Masood Ahmed, IMF中东和中亚处主任，2007年负责了一项关于低收入国家的IMF调研项目。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aron, 2003, “Root Cause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40 (June), pp. 27–30.
- ,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2008,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A, ed. by Philli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Collier, Paul, 2007,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5, “Our Common Intere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frica” (March).
-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World Bank).
- IMF, 2008a, “Food and Fuel Prices—Recent Developments, Macroeconomic Impact, and Policy Responses”;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8/063008.pdf>
- , 2008b,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mpact of the Food and Fuel Price Shocks on Low-Income African Countries: A Country-by-Country Assessmen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8/063008a.pdf>
- , 2008c, “Private Capital Flows to Sub-Saharan Africa: Financial Globalization’s Final Frontier?”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 Kharas, Homi, 2007, “Trends and Issues in Development Aid,” Wolfensoh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1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 Ratha, Dilip, Sanket Mohapatra, and Sonia Plaza, 2008, “Beyond Aid: New Sources and Innovative Mechanisms for Financing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609 (Washington: World Bank).
- Rodrik, Dani, 2004, “Getting Institutions Right” (Unpublish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 Wakeman-Linn, John, and Pirooska Nagy, 2008, “More Investors Turn to Sub-Saharan Africa,” IMF Survey Magazine onlin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8/CAR012A.htm>